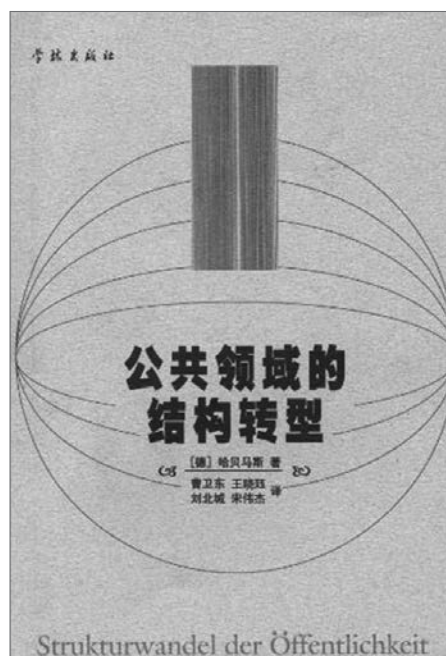


# 法國舊制度晚期的「公共領域」 ——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理論」的適用性

● 徐前進

德國社會學家哈貝馬斯 (Jürgen Habermas) 根據英、法、德的歷史構建了「公共領域理論」，以此分析現代社會的行為機制。十八世紀，代表型公共領域向資產階級公共領域過渡，十九世紀，現代報業成就了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批判功能，二十世紀，輿論的商業化和被操縱的現實消解了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批判精神。代表型公共領域包含教會、貴族和宮廷三類，它的出現與一套關於高貴的繁文縟節有關：權力象徵物 (徽章、武器)；生活習性 (衣着、髮型)；行為舉止 (問候、手勢) 等。資產階級公共領域源於現代早期的商品交換、資訊傳遞、書報出版，以及閱讀方式的變化，強調社會成員的親密無間，公開論辯時不再注重儀式的莊嚴，而是着重平等與獨立的精神，不盲從權威，教權時代的虔誠與君權時代的服從不見了，教士、貴族、廷臣等舊的身份特徵讓位於新興的職業分類和經濟地位<sup>①</sup>。這一理論能否用於普遍的歷史分析？不同的國家是否有例外的情況？

哈貝馬斯強調歷史中的同質性因素，忽視了與理論相悖的事實，為此，德國學者批評他僅依靠二手材料，欠缺經驗性研究，對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過份渲染導致了不正確的理想化<sup>②</sup>。十八世紀的英國歷史可為哈貝馬斯的理論提供有效的依據；但針對同時代的法國歷史，他的理論未能涵蓋公共輿論的缺陷，以及舊制度



哈貝馬斯 (Jürgen Habermas) 著，曹衛東等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上海：學林出版社，2004)。

對自由意識的壓制，所以本文認為，代表型公共領域向資產階級公共領域轉變的論斷並不成立。在法國式的專制制度之下，報刊輿論受到嚴格監視，並不能行使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職能，結構轉型也就無從談起。

## 一 法國啟蒙時代的對抗性社會

法國大革命前，自由、平等的觀念已有萌芽，但舊制度官僚缺乏現代政治意識，不寬容，代表型與資產階級公共領域是混雜的，沒有漸次的轉變。七年戰爭 (Seven Years War, 1756-1763) 後，由於戰敗危機和路易十五 (Louis XV) 的無能，大眾批判意識高揚，以宮廷和教會主導的代表型公共領域衰落，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由文學化向政治化過渡。有鑒於此，舊制度極力左右民眾的思考，為此制訂了一系列措施，強化輿論審查，鼓勵那些對抗文人團體的報紙，由此導致公共輿論裏缺乏確切的資訊，只是論戰的風格，無助於政治和文化實踐<sup>③</sup>。

於是，在扭曲的制度下有許多諷刺的場景，其中之一是「熱銷的禁書」。普通民眾對真實性的渴望沒有消失，而愈是受到限制的書刊愈能揭露舊制度的流弊，愈能承載讀者的批判意志，於是容易銷售，利潤也高。出版商遂將辦報紙和書刊的地點設在荷蘭、瑞士等允許自由出版的地方，書刊經由匿名撰稿人、地下出版商、印刷商、書商和運輸商構成的走私網絡運抵法國。為舊制度服務的警察間諜在利益的誘惑下，不經意間成為現代批判精神的同路人。

另一個諷刺場景的主角是有傷風化的警察群體。當時法國的警察隊伍中有兩類人值得注意：一是間諜、密探；二是僕從、下級人員。他們不是正式人員，承擔的任務隨意，常常四處行動，充當宮廷間諜、城市間諜、牀邊間諜、道路間諜，盡力捕捉那些能帶來收入的異端言論。警察內部紛爭不斷，職位高的間諜會監視下級隨從，看他們是否盡職盡責；大小間諜有時會相互指責，為了卑微的收入不惜為敵<sup>④</sup>。在正規的警察隊伍裏，這樣的現象也很常見，根據啟蒙後期作家布里索 (Jacques-Pierre Brissot) 的記載，古皮 (Pierre-Antoine-Auguste Goupil) 是舊制度晚期巴黎警察局的下級警察，負責圖書審查，妄圖以陰謀詭計獲得晉升，結果冒犯了警察局的副官勒努爾 (Jean-Charles-Pierre Lenoir)，於是被關入巴士底獄，後又轉移到文森監獄，「在押期間，突然死亡」<sup>⑤</sup>。儘管混亂不堪，「正是這群讓人畏懼的敗類維持着公共秩序」<sup>⑥</sup>。面對一群粗暴之徒，那些冒犯權威的人、印刷禁書的出版商、經營走私生意的零售商往往心存畏懼。

當時有幾個震驚一時的案件，舊制度在處理時強化行刑過程，維持代表型公共領域的炫耀式傳統。圖盧茲 (Toulouse) 的新教徒卡拉 (Jean Calas) 經商持家，他的兒子馬克 (Marc-Antoine Calas) 信奉新教，但新教徒不能入讀大學，馬克又不願子承父業，因此終日無所事事，性情悲觀。1761年10月13日，馬克在家懸樑自殺。很快有傳言說，馬克是被父母害死的，原因是企圖讓馬克改宗舊教。卡拉一家極力澄清，但解剖報告

含糊其辭，「有可能是自殺，有可能是他殺」。在不寬容的宗教氣氛中，主審法官輕信傳言，卡拉被關押，自始至終沒有辯護律師。次年3月9日，圖盧茲議會以8：6的票數判處卡拉極刑，第二天執行。行刑時，劊子手撕拽他的手臂和大腿，直到脫臼，又灌了30品脫(pint)的水，之後綁在廣場的十字架上，用鐵棒打斷他的臂骨、腿骨和肋骨，最後又將他綁在車輪上，卡拉受盡痛苦後死去<sup>㉞</sup>。

天主教會以野蠻的方式維護尊嚴，世俗體制同樣如此。1757年1月5日，路易十五上馬車時，退役軍人達米安(Robert-François Damiens)用刀將他刺傷，受了一點輕傷，達米安當場被捕，遭嚴刑逼供，審訊無果，高等法院以弑君罪判處極刑。3月28日，在巴黎格萊維廣場(Place de Grève)上，劊子手先用燒紅的鐵鉗撕掉達米安的肉，後將融化的蠟和鉛澆在傷口上，又用四匹馬肢解，最後將屍體燒成灰燼<sup>㉟</sup>。行刑過程成了一道公共景觀，好奇的民眾甚至要大花金錢才能獲得好的觀測點。1873年，法國文學家蒙瑟萊(Charles Monselet)想像了達米安臨刑前眼中的世界，反思法國舊制度的看客風俗<sup>㊱</sup>：

他看到的是人群，總是人群，在莫特利埃(Mortellerie)大街，在瓦納里(Vannerie)大街，在塔納里(Tannerie)大街，在埃皮奈(Épine)大街與穆東(Mouton)大街交匯處，人群佔據了所有觀測點，廣場上下層人居多，不遠處樓房的窗戶後面聚集着優雅時髦的人，或是紳士貴族，或是上層社會的夫人，搖着扇子，隨身帶着小瓶子，裝着喝的東西，以防止眩暈。

達米安的死並不是結束，1757年3月26日，凡爾賽宮下達針對達米安家人的法令：兩星期內，達米安的妻子伊莉莎白(Elisabeth Molerienne)、女兒瑪麗(Marie-Elisabeth)、父親皮埃爾(Pierre-Joseph)離開法國，永遠不能回來，否則判處絞刑；達米安的哥哥路易(Louis)及其妻子伊莉莎白(Elisabeth Schoirtz)、姐姐卡特琳娜(Catherine)和另一個哥哥安東奈(Antoine-Joseph)，還有該家族中以「達米安」為姓氏的大人、孩子都要更改姓氏<sup>㊲</sup>。

舊制度以人的身體為道具，構造具有震懾意義的場景，不人道之處在於過份信任暴力的規訓作用，輕易否定父母子女間的情感。在舊官僚的意識中，父母殺死親生子女不存在倫理與情感的障礙。達米安對路易十五的無禮舉動理應受到懲罰，但有意製造的暴力場景，雖能說明君權不容侵犯，卻不符合健全社會裏尊重人身權利的要求。民眾對君權和教權的信仰與歸屬感日漸淡漠，取而代之的是懷疑、不屑，甚至是敵意。1575年最終形成的《王國基本法》(*Lois fondamentales du royaume*)所規定的權力秩序此時對於人心不再有絕對的規束力，更糟的是，以國家名義塑造的暴力場景在民眾的意識中培育了以暴力對抗暴力的意識。

## 二 舊制度公共領域 轉型的失敗

糾纏於法國歷史的複雜性，難有理論上的創造；若置之不理，相關的思考會有風險。哈貝馬斯的「公共

領域理論」已是分析法國現代社會的範式——一種「演繹史學」的依據，以之為研究根據的人往往不去檢驗它是否合乎歷史情境。舊制度風俗對之提出質疑的，首先是扭曲的啟蒙輿論空間，雖然哈貝馬斯視之為「公眾自我啟蒙的過程」<sup>⑪</sup>，然而「公眾」裏有能力訂閱報刊的並非以商人和工業家為主，而是公務員、金融家、有定期收益的貴族，還有律師<sup>⑫</sup>。他們依賴舊制度，對於新生的資本體系，以及現代意義上的自由、平等觀念缺少認同。咖啡館、郵局等公共場所聚集着關心公共話題的民眾，由於道聽途說，他們了解的資訊、發表的評論離真實更遠。以訛傳訛，對健全的公共交往是有害的。

哈貝馬斯對於咖啡館的現代式想像美化了歷史中的沉悶，事關理性與公益的辯論確實會在咖啡館上演，但那裏也是流言的發酵地，充斥着高傲、無聊與冷漠。十八世紀的文人杜克洛 (Charles Duclos) 記錄了巴黎普洛科普 (Procope) 咖啡館的場景：戲劇家布瓦丹 (Nicolas Boindin) 獨自高談闊論，不與人打交道；歷史和語言學家弗萊勒 (Nicolas Fréret) 慣於推理，時常訴諸引文；古典學家特拉松 (Jean Terrasson) 神父有哲學精神，在希臘語、拉丁語和幾門現代語言上學養深厚，兼具幾何學家、物理學家的素質<sup>⑬</sup>。啟蒙晚期的文人梅西耶 (Louis-Sébastien Mercier) 評論過咖啡館裏的場景：「閒言碎語最惹人煩，卻一刻不停地聚集在報刊雜誌上，巴黎式的輕信沒有限度……有一個人上午十點到咖啡館，晚上十一點離去，只在那裏喝加了牛奶的咖啡，吃蛋黃牛奶湯。」<sup>⑭</sup> 舊制度末期，公共

輿論裏傳言不斷，毫無真實性可言，啟蒙時代流行一時的雜談類刊物《十八世紀秘聞》(*Anecdotes secrètes du dix-huitième siècle*) 對此有嚴厲的批評：「在這個違背常理的世紀，放蕩、令人討厭的卑劣言行大行其道，法國人只關心細節、麻煩事、無聊的陰謀，以及沒有分寸的奇聞軼事。」<sup>⑮</sup>

1775年，時任國務秘書的馬勒澤爾布 (C.-G. de Lamoignon de Malesherbes) 向國王路易十六 (Louis XVI) 呈交的《勸諫書》(*Rémontrances*) 裏有開明的理念：建立普遍的公共秩序，要將一切案例公開化，印發報告，讓公眾旁聽作證，擴大他們參與的範圍。然而如前所述，在路易十五時代，鑒於泛濫的輿論，警察間諜盛極一時，公共空間受到嚴格監視，「在巴黎，民眾活在槍口之下，面對警察官員時涕淚橫流」<sup>⑯</sup>。更糟的是，文人迫於生存壓力或是警察的計謀而成為間諜，諸如《法國信使報》(*Mercure de France*) 的主編費雷隆 (Louis-Marie S. Fréron) 和下層文人布里索，他們熟悉文學共和國 (即現代意義的「啟蒙思想界」) 的機制，容易捕捉到反教會、反政府的言論。只是「文人間諜」貽害深遠，一個人可以有雙重身份，而且是截然不同的身份；忠誠與背叛、善良與邪惡的界限變得模糊，在相互猜疑與戒備中，健全的公共交往難以維持。

舊制度後期有許多學會、科學院、閱讀會等，與之相應的是不同的趣味：崇古或厚今，勇敢或怯懦，為理想社會呼籲或為專制權力辯護。民眾本來就難以在批判方向上形成共識，即使發現了變革社會的良策，可是在高壓環境下避之不談，結果，關

於風俗的變革(甚麼是合理的政治制度、如何改良教育、如何培育美德)，政治家、貴族、文人、教士間聚訟紛紜，更沒有實踐的基礎。一方冷漠無知，一方激昂義憤、不切實際，雙方常有激烈的對抗。所以，那時雖有自由的迹象，卻是非正規的，時斷時續，缺乏法律和道義的保障。

哈貝馬斯將十八世紀法國重農派(École des Physiocrates)沙龍視為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存在依據<sup>⑦</sup>，但它受到宮廷的保護，根本不是資產階級的語言空間，儀式中的貴族特質難以去除，參與其中的是文學共和國的上層「公民」，他們措辭謹慎，在關鍵問題上或是迴避，或是陷於空談。這是舊制度時代巴黎沙龍的普遍特點——形式重於內容，說教偏離現實。達朗貝爾(Jean Le Rond d'Alembert)、愛爾維修(Claude A. Helvétius)、雷納爾(Guillaume-Thomas Raynal)神父等啟蒙哲學家去沙龍主持人若弗蘭(Marie-Thérèse Rodet Geoffrin)夫人家用餐後，又到杜依勒宮，打探凡爾賽宮的消息，然後圍坐於樹下，對一切高談闊論，「他們沉醉於其中，無拘無束，就像呼吸空氣那樣自由」<sup>⑧</sup>。但他們的談話內容沒有進入公共空間，只流傳於不受舊制度監視的私人話語體系，即使因不合時宜而受到權力的譴責，也有通融的餘地。

十八世紀，法國文人分為四類：(1)特權階層(神職人員、佩劍貴族、穿袍貴族、軍官和政府人員)；(2)貴族屬下(秘書、圖書管理員和家庭教師)；(3)寫作愛好者；(4)職業作家。其中，職業作家的生計依賴於舊制度體系，尤其是那些出身低微的人。1775年，

當時已是魯昂科學院(Académie de Rouen)院士的拉哈珀(Jean-François de La Harpe)想進入法蘭西學院，憑一己之力異常困難，同年3月，他在內克夫人(Madame Necker [Suzanne Curchod])的沙龍裏朗讀他創作的悲劇《蒙茲考夫》(Menzikoff)——一個關於俄國王子流亡的故事，獲得好評<sup>⑨</sup>。聽眾裏有外交官和貴族，包括英國駐法大使、盧森堡將軍(Maréchal de Luxembourg)和德方夫人(Madame Du Deffand)。次年，這部戲劇得以在楓丹白露宮上演，王后很喜歡，為拉哈珀清除了進入法蘭西學院的障礙<sup>⑩</sup>。

「彬彬有禮的沙龍」是十九世紀的發明，確切地說，是工業化時代的懷古情結面對物質化交往時的虛構，文學巨匠如巴爾扎克(Honoré de Balzac)、司湯達(Stendhal)、多爾維利(J. Barbey d'Aurevilly)等人的美化掩飾了十八世紀沙龍中的利益交換和殘酷的生存鬥爭<sup>⑪</sup>。主持沙龍的貴夫人與文人相互尊重，這是表面的禮儀，僅能維持平等的假象，而且通常是在大人物控制場面時才會上演。所以，彬彬有禮不能消除交往中的緊張、力量差別，以及財富多寡(引起的不平等)，舊制度下的沙龍存在明顯的分化<sup>⑫</sup>。

舊制度時代的報刊仍舊是代表型公共領域的風格。《法國信使報》設有固定欄目：戲劇、詩歌、國外見聞、宮廷近況、讀者來信等，塑造的是君權的威嚴。為吸引民眾，該報力求確立讀者與作者的平等關係，對依附於權力的偽真理有所抨擊，但在書報審查之下，它時常退縮，多刊登缺少批判意識的文章，諸如〈關於如何減少病人痛苦的問題〉等<sup>⑬</sup>。而這樣的

公共空間不具備獨立的思考力，只能在不觸犯王權和教權的限度內尋求知識，對於危急的舊制度寥有益處。

根據哈貝馬斯的敘述，當資產階級由私人轉變為公眾，進而成為新型公共領域的主體時，代表型公共領域的陳規陋習將土崩瓦解<sup>24</sup>。這與法國歷史多有出入。舊制度後期，教權、君權和現代意識交錯不清，法國大革命前，宮廷與教會控制着主要的出版物：《法國信使報》、《法國公報》(*Gazette de France*)、《學者報》(*Journal des savants*)等；貴族階層掌控各地的科學院，根據奧爾良(Orléans)地區人頭稅的資料，九成院士由貴族擔任。既然如此，文人交往時難以避開貴族，與伏爾泰(François-Marie Arouet Voltaire)、孟德斯鳩(Charles de Montesquieu)通信的多是巴黎人，以高級教士和貴族居多，與狄德羅(Denis Diderot)、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通信的人多是神父和牧師<sup>25</sup>。所以，有才智的平凡人若想在舊制度

裏獲得身份，要求助於代表型公共領域的機制。

路易十四(Louis XIV)時代，君主制有助於法蘭西民族意識的形成，但君主凌駕於國家之上，弊端明顯。波旁(Bourbon)王朝的國王認同一個理念：國王是半神，任意主宰王國的機構，指導臣民事務。君權體制的合法性不是一勞永逸的，需要不斷強化，也就出現確定權威的象徵物，比如衣着、髮型等生活象徵，問候語、手勢等言行象徵，徽章、武器等權力象徵，「一言以蔽之，那是一套傳達高貴的繁文縟節」<sup>26</sup>。路易十四是唯一的公共人物在勝利廣場(Place des Victoires)和旺多姆廣場(Place Vendôme)上擺着他的畫像和戰利品，以塑造國王的權威。對外宣傳中，廷臣多以輔佐性的角色出現<sup>27</sup>。國王以其性格影響宮廷，宮廷以此影響城市，又從城市傳播到鄉村，法國人追隨國王的習性，「主權者的靈魂像模子一樣為所有人設定形式」<sup>28</sup>。



法國畫家勒莫尼(Anicet-Charles-Gabriel Lemonnier)虛構了1755年討論伏爾泰的悲劇《中國孤兒》(*L'Orphelin de la Chine*)的場景，是十九世紀的人對啟蒙沙龍的美化。(圖片由徐前進提供)

在代表型公共領域中，批判精神是受排斥的，曲意奉承才是暢通無阻的修辭。1747年，昂熱皇家科學院 (Académie Royale d'Angers) 主持徵文比賽，題目是「科學與藝術的進展得益於國王的庇護」<sup>29</sup>。科學新發現首先要獻給國王，以虛假的恭敬向他致謝。1749年，在一份新版法國地圖上，註有作者希望以此「鞏固國王的功績和臣民事業的聯合」的字句<sup>30</sup>。報刊中時常有讚揚國王的文章，1749年8月，《法國信使報》刊登〈路易十五與路易十四的比較〉(“Parallèle de Louis XV avec Louis XIV”)，說道：在國王的心裏，有多少對忠實民眾的愛啊<sup>31</sup>。總之，國王是舊制度輿論的中心，廷臣無不是輔佐的角色，獨斷的權威會危及個體的自由意志，公開出版物縮頭縮腦，絕無勇敢者的儀態，獨立精神難以培育。

所以，十八世紀中期，法國在一些方面具備了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特點，本質上卻難以擺脫君權和教權的控制，他們嚴格監視報業，隨時取締，新興階層參與公共討論的意圖時常受挫。十八世紀上半葉，法蘭西學院雖為天主教高級教士、貴族階層佔據，但也向普通人開放；十八世紀下半葉，學者的思考變慢了，學術圈開始封閉，少有創新的思想，多是重複的知識，「像是一個失去芳華的夫人，不再楚楚動人，只願接納能夠保護她的人」<sup>32</sup>。制度已失去活力，公共領域的革新無從談起，只能借助於暴力革命來瓦解高傲者的說教。

根據哈貝馬斯的理論，舊制度向現代國家過渡時，君主與臣民、信仰與救贖的關係為代議制政府和市民社會的關係取代，由此形成國家與社

會的共存模式。社會力量表現在資產階級公共領域，它講求理性，在平等的爭論中尋求共識；與此同時，專制權力為代議制國家取代，壓制自由觀念和暴力執法的現象消失了，作為國家的象徵，政府有了全新的職能，注重公共事務管理。所以現代國家的存在前提是權力來源的合法性，以及市民社會對權力的制約。1787年，法國學者塞拉那 (Philippe Serane) 注意到社會的形成依賴於人與人之間的信任，也依賴於人與社會的良好融通：一個人生活於社會之中，不只屬於自身，而是社會的一部分，他通過施展身體力量、心中的美德與智慧而成為社會的支柱、榮耀與欣慰<sup>33</sup>。但在僵化的舊制度下，類似的設想不見蹤迹，具有人道主義和民族責任感的個體精神受到強有力的監視，美德與智慧受到冷落，坦率的批判與反思被視為畏途。

公共交往中充斥着偽善，個體在不真實的輿論中身份不定，貴族依靠王權、文人尋求貴族的支持，普通百姓面對教會與世俗權力機構 (宗教裁判所、監獄) 時心存恐懼，呈現為一幅小人物屈服於大人物的風俗畫。這意味着十八世紀的法國沒有健全的社會，人心鬆散，無力對抗舊制度體制，而專制性的權力最希望看到這樣的景象，因為它可以為所欲為。民眾的心裏仍有良善，至少是同儕間的友愛與溫情，但在不公正、不平等的時代，這些品質並不堅定，不時會滑向惡，人人相互為敵，相遇時的一瞥流露的是陌生與疑慮。很難想像一個未經世事的青年在接受巴黎警察局的間諜任務後，就變成了有益批判與崇高理想的敵人；同樣很難想像與他相識的人，尤其是那些在不知不覺

中受其監視的人，在得知他的晦暗角色之後會是怎樣的驚詫與惶恐。十八世紀的法國就是這樣，一幕幕動物世界的場景，其中的貪婪、奴役與無助甚至比動物世界的生存法則更慘烈。

如前所述，儘管存在史實與理論間的錯位，哈貝馬斯的一個觀察卻是準確的：法國大革命為懷有政治批判意識的公眾創造了新機制，「一夜之間創造了英國經過一個世紀的緩慢進程才取得的成果」<sup>④</sup>。這一論斷多少意味着他認識到法國歷史的獨特性，政治劇變最大程度上影響了現代思想的進展。只是在激進民主實踐中出現了無法控制的暴力，雖不同於教權與君權的霸道，卻一樣讓人厭惡與恐懼，對於現代制度的建設鮮有益處。法國大革命時代，德國流行一首諷刺詩：「在這個廣為傳誦的口號面前，民眾的老爺們戰戰兢兢，好意地拍拍他們的假髮：豎起你們的耳朵，這個詞就是公共性。」<sup>⑤</sup> 革命後，「公共性」有了恐怖的色彩，時而受到質疑：大眾民主化的趨勢中會不會出現多數人的暴政？

### 三 結論

十八世紀的法國有三個輿論空間：孕育新思想的文學共和國，舊制度控制的代表型公共領域，以及迫於書報審查、間諜制度而形成的隱晦的語言空間。文學共和國的話語體系最大限度地包涵着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特點，個體交往中具有平等、自由的氛圍；但舊制度的影響力一直延續到大革命的爆發，它所維繫的是代表型公共領域，以警戒性的話語維持君

主和教會的威嚴；新舊邊界上盛行的是壓制與妥協的話語體系，批判精神受到限制，為躲避牢獄之災，民眾會屈從，但只是一種擺脫壓制的策略，而非對舊制度的絕對依從。哈貝馬斯參考的是文學共和國的話語體系，對另外兩個空間缺少思考。

法國歷史提供了現代公共領域的另一種形成模式：以革命的方式瞬間造就自由、平等的輿論空間。這一模式不足以否定哈貝馬斯的理論，普遍意義上，它仍然是分析傳統社會向現代國家過渡以及市民社會起源的依據。廣而言之，從複雜多變的歷史中歸納普遍規律，屬於歷史認識論或歷史哲學的範疇；一種觀念上的冒險，面臨或多或少的不確定性，但偏頗與不確定不是拒絕歷史宏觀分析的理由，因為這是列舉事實或表象敘事所欠缺的視野。

#### 註釋

①①①①②③④⑤ 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著，曹衛東等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上海：學林出版社，2004)，頁7、15、36；46；79；6；7；80；81。

② 哈貝馬斯：〈1990年版序言〉，載《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頁3-4。

③ Eugène Hatin, *Histoire politique et littéraire de la presse en France*, tome I (Paris: Poulet-Malassis et De Broise, 1859), xvii; Mona Ozouf, "L'opinion publique",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Modern Political Culture*, vol. 1, ed. Keith M. Baker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87), 421.

④⑥⑩ Louis-Sébastien Mercier, *Tableau de Paris*, tome I (Amsterdam: J. Pinard, 1783), 116, 117; 116; 116.



⑤ M. de Lescure, *Mémoires de Brissot* (Paris: Firmin-Didot, 1877), 86.

⑦ Athanase-Josué Coquerel, *Jean Calas et sa famille* (Paris: Cherbuliez, 1869), 83, 190-92, 342.

⑧ 福柯 (Michel Foucault) 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北京：三聯書店，1999)，頁3-5。

⑨ Otto Flake, *Le Marquis de Sade*, traduit de l'allemand par Pierre Klossowski (Paris: Bernard Grasset, 1933), 11-19.

⑩ “Sentence prononcée contre la famille de Robert-François Damiens le 29 mars 1757”, *Damiens attaque Louis XV, Documents complémentaires*, [www.coutumes-et-traditions.fr/medias/autrefois/annees/1757/texte-damiens.pdf](http://www.coutumes-et-traditions.fr/medias/autrefois/annees/1757/texte-damiens.pdf), 5.

⑪⑫ David A. Bell, “The ‘Public Sphere’, the State, and the World of Law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17, no. 4 (1992): 916; 917, 918.

⑬ Louis-Simon Auger, ed., *Œuvres complètes de Duclos*, tome I (Paris: Janet et Cotellet, 1820), cij-cijj.

⑭ Louis-Sébastien Mercier, *Tableau de Paris*, nouvelle édition, tome I (Amsterdam: sans nom, 1782), 150.

⑮ Pierre-Jean-Baptiste Nougaret, *Anecdotes secrètes du dix-huitième siècle, 1774-1779*, tome I (Paris: Léopold Collin, 1808), i, iv.

⑯ 參見德·巴克 (Antoine de Baecque)、梅洛尼奧 (François Mélonio) 著，朱靜、許光華譯：《法國文化史》，卷三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頁43。

⑰ Jean-Françoise de La Harpe, *Menzikoff ou les exilés, Tragédie* (Paris: M. Lambert & Baudouin, 1781).

⑱⑲ Antoine Lilti, “Sociabilité et mondanité: Les hommes de lettres dans les salons parisiens au XVIIIe siècle”,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28, no. 3 (2005): 426, 423; 419-20, 426.

⑲ Antoine Lilti, *Le monde des salons: Sociabilité et mondanité à Paris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Fayard, 2005), 19-20.

⑳ “Lettre aux auteurs de Mercure comme l’objet principale de vos travaux est l’utilité & l’instruction de Public”, *Mercure de France*, août 1749, 205.

㉑ Daniel Roche, *Le siècle des lumières en province, Académies et académiciens provinciaux, 1680-1789*, tome I (Paris: Éditions de 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1978), 226, 297.

㉒ Louis-Sébastien Mercier, *Tableau de Paris*, tome III, 367.

㉓ “L’Académie Royale d’Angers avoit proposé l’an 1747 un prix, dont le sujet est le progrès des Sciences et des Beaux Arts sous le Règne de Louis XV”, *Mercure de France*, août 1749, 164.

㉔ “Réflexions sur la nouvelle carte que M. de Thuri vient de donner au Public”, *Mercure de France*, août 1749, 79.

㉕ “Parallèle de Louis XV avec Louis XIV”, *Mercure de France*, août 1749, 78.

㉖ Pierre-Jean-Baptiste Nougaret, *Anecdotes secrètes du dix-huitième siècle, 1774-1779*, tome I, 113; Daniel Roche, *Le siècle des lumières en province, Académies et académiciens provinciaux, 1680-1789*, tome I, 55, 287.

㉗ Philippe Serane, *Théorie d’une éducation républicaine suivant les principes de J.J. Rousseau présentée à la Convention* (Paris: chez l’auteur, 1787), 6.